

中国图书年鉴1995

杨牧之 编

湖北人民出版社

书名：中国图书年鉴1995

作者：杨牧之

ISBN：7-216-02650-0/G692

责任编辑：胡光清

字数：1843千

出版日期：1999年9月5日

定价：99元

'94 全国图书选题评析

杨牧之

审读图书选题是新闻出版署对图书出版进行宏观管理的一项重要工作,但今年又有特殊的意义,因为我们正面临着新闻出版工作如何落实“阶段性转移”的战略任务。近期,我们对今年的图书选题作了一些评析,希望能引起出版社的注意。

截止到3月初,新闻出版署图书管理司对已报来的全国450家出版社的1994年图书选题进行了系统的审读。审读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一个指针,四项任务”。即以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根本指针,以江泽民同志要求的“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为主要任务。大力贯彻新闻出版署党组提出的新闻出版工作要“从总量增长为主要特征的阶段向以优质高效为主要特征的阶段转移”这样一个要求,着眼于为改革开放服务、为经济建设服务,着眼于高扬我们时代的主旋律。

一、总量分析

我们总计审读了450家出版社报来的选题59784种,平均每家133种。如果以这个平均数计算,将未报来的100家出版社的选题,计13000多种统计在内的话,1994年全国出版社的选题,合计约73000种。考虑到年中的时候出版社一般还要调整选题(有增有减),以及有的出版社由于种种原因还有部分选题未报等因素,总数还会增加。就一般而言,出版社每年增补的选题约占年初所报选题总量的25%左右,也就是说,1994年的选题预计是73000种,再加上它的25%,约计90000种左右,会比1993年的出书总量(97000种)有所下降。

就1994年选题来看,在总的减少、下降的趋势中,各社的情况也有所不同。一些老社、出版条件好的地区的出版社,选题控制得反而紧,如:军队17家出版社共报选题2266种,比去年降低16.3%;浙江

省局直属社共报选题828种,平均下降4%;广东省局16家出版社报来选题1523种,比去年降低2.5%;江苏省局15家报来选题1795种,也比去年有所下降;上海市33家出版社,品种总量继续控制在零增长。相反,出版条件不那么好的,特别是一些新建社,选题品种却猛增,如:有一家新建社,各方面条件都不算强,三四十人却安排了338种选题。这实在是多了。

今年四川各出版社选题有很大改进。全省20家出版社,共报来2476种选题,平均每家124种,在全国的平均线以下。但重点书却有526种,占21.2%。

当然,不能一概说选题减少了,图书品种减少了就好,但从当前出版社的实际情况来讲,由于人员素质、经济实力、印刷发行条件等方面的限制,控制或适量减少图书品种总量,是保证图书质量,提高效率,促进繁荣的必要手段。

二、结构分析

从1994年的图书选题结构情况看,各学科分类比例大致平衡,选题结构比较合理。已审读的59784种选题的分类情况大致如下:

科技类选题18857种,占选题总数的31.5%;
社科类选题19336种,占选题总数的32.3%;
文艺类选题8760种,占选题总数的14.6%;
教育类选题9251种,占选题总数的15.5%;
少儿类选题3580种,占选题总数的6%。

在社科类选题中,数量最大的是经济类和法律类选题。这是正常的,因为这两类图书为现实和实践的服务更直接,已成为社科类选题和图书的两大支柱。科技类选题一般占全部选题的1/3左右,这适合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要求。科技图书中又以应用技术类选题为最多,占科技类

选题的30%以上。文学类选题的结构情况是:30家文学出版社平均每家选题116种,比去年平均200种下降40%,但重点书却有480种之多,占全部选题的13%,比去年的8%增加了5个百分点。这是个可喜的现象。

在整体结构中,很多出版社重视高品位、高质量的学术著作,如浙江人民社占49%,浙江文艺社占36%,浙江古籍社占22%,杭州大学出版社占71%。这种平均高水平的情况,值得倡导。

出版社按专业分工安排选题是保持合理结构的重要因素。专业分工,对出版社既有约束,又是其优势和长处所在。从今年选题情况看,超分工安排选题的现象大为减少。如四川7家大学出版社,今年对选题超分工现象严加控制,教材、学术著作占到70%以上,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但也有的出版社在这方面注意不够。有4家师范学院出版社的选题超分工现象严重。其中一家,大专教材、学术著作选题只占32%,辅导类读物选题达47%,幼儿读物选题达9%。这个结构显然是不合理的,因为大学出版社主要是为教学和科研服务,大专教材、学术著作比例太小,显然是与办社宗旨不相一致的。

从今年的选题结构来看,重版书的比例比去年又有所提高。重版书是反映图书的文化积累价值和图书整体质量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据对部分出版社重版书比例的统计,重版率已达到选题总数的27%,比去年增加3%。如:商务、人民文学、人民教育、科学、中少等社及上海市33家出版社的重版率都在40%以上。一些地方出版社的重版率也有所提高,如山东科技社重版书达43.2%。成都地图出版社今年安排选题74种,重版书28种,占38%。一些年轻的社重版率也在提高,如中信社达35%。但也有不少出版社重版率还不到10%,有的甚至全是新书,没有能够拿来重版的图书。这一点应引起有关出版社的高度重视。

三、内容分析

如果说以上两方面是对1994年选题做的直观分析的话,那么,对选题素质优劣,品位高低的分析,便是对其内容做出的深入分析。这里,我们重点对社科类选题、文学类选题、少儿类选题和科技类选题做出分析。

(一)社科类图书选题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

特点一: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选题占有十分突出的位置。继1992—1993年出版了新版《列宁全集》(60卷)、新版《毛泽东选集》(1—4卷)、《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之后,1994年这方面又有几个大的工程:《马恩全集》(第二版),这是经中央批准的又一大工程,计划15年出齐,去年开始发稿,今年计划出版前3卷;《列宁选集》(第二版),根据新版《列宁全集》重新编辑;《毛泽东文集》经中央批准,系“八五”重点规划选题,去年出版了一、二卷,今年将出版三、四卷,计划1995年全部出齐;重编再版《邓小平文选》一、二卷。

特点二: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方面的选题,有很大的拓展,选题多而不乱,注重质量和效果。

特点三:经济类和法律类图书选题已成为社科类图书选题的两个支柱。1994年的这两大类选题贴近现实,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强,如《实用期货交易手册》、《中国大陆涉台法律》、《市场经济实用法律法规快通丛书》等。

特点四:有关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教育方面的选题大大增多和优化。

1994年社科类图书选题也有几个特别值得注意的问题。

问题一:特别应该注意以下4类选题:

(1)关于描写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生活和工作情况的图书选题。这类书并不是不许出,而是有分工,还要履行报批手续,要经有关权威部门审定书稿内容,这既是对读者负责,也是为作者和出版社负责。

(2)有关民族宗教问题的选题。这类图书如描写不当,容易引起不良后果,今后对这类选题应该十分慎重。中宣部、统战部、新闻出版署、国家民委和宗教局已经联合下发有关文件,请各有关出版单位严格遵照执行。

(3)有关在军事、外交方面防止泄密的问题,1993年教训不少,有关方面已有规定,请大家严格执行。

(4)有关“文革”的图书选题。去年这方面图书出了一些问题。诸如《文革酷刑录》、《文革死亡档案》等书,效果不好,应该吸取教训。应当肯定的是,任何历史都是可以而且应该研究的,但“文革”这段历史,背景确实很特殊,写得不好容易导致翻腾旧

帐,引起矛盾,甚至会干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因此,应当十分慎重地对待有关“文革”图书的出版。确有研究价值的书稿,经过有关部门审批,还是可以出的,但那种专以记录“奇闻轶事”为能事的东西,就不要出了。

问题二:有关政治生活中容易导致不稳定问题的图书选题,要慎之又慎。另外,对政治生活的猜测,将道听途说的材料演绎成书,此类做法很不严肃,这种书不能出版。

问题三:宣扬封建迷信的图书选题。我们对这类书有过明文规定,任何出版社不能出版宣扬封建迷信的图书。

问题四:1994年选题重复、追逐热点,仍比较严重。

热点一是股票、期货方面书,去年已出了200多种,今年仍安排了不少。

热点二是大型古文今译,吃老祖宗的饭,几十个人半年、一年就编译出上百万、上千万字的东西,质量很难保证。现在我们正组织力量就这方面的书进行质量检查。

热点三是中小学生的教参、教辅图书,许多出版社超分工的都是这类图书,给中小學生及家长造成很大的负担。

热点四是生活类用书,这方面的书安排得太多,而且大多重复,造成浪费。

(二)文学类图书选题的特点及趋势

今年文学类图书选题有许多可喜之处。

第一个可喜的现象是:当代长篇小说的选题有突出的增长。多年来,长篇小说的创作比较寂寞,好的长篇小说不多,令人交口称赞的就更少。今年这方面的图书可望有所突破。从选题上看有这样几个特点:

1. 量多。长篇小说选题数量的增多,说明文学图书的出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开始建设富有时代气息的新的文学大厦。30家文艺类出版社报来的长篇小说选题有600多种,占整个文学类选题的18%,比去年增加了10%。

2. 作者阵容强大。如:谌容(《人过中年》)、张炜(《你在高原》)、韦君宜(《露沙啊,路在哪里》)、魏巍(《心程》)、周而复(《雾重庆》)、黎汝清(《故园暮色》)等等。这些作者都是久负盛名,颇有功力的。这就给小说创作的质量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3. 从内容方面看,多为严肃的纯文学作品,出

版的品位在逐步提高。

第二个值得高兴的现象是:港台的通俗小说、浅层次的武侠小说选题大大减少。通俗文艺作品各文艺社报来的选题仅100种左右,而其中大陆版的通俗文艺作品又比港台的多。出版社将注意力由港台通俗作家身上转移到大陆作家身上来是明智之举。因为,无论从人数、作品分量和著作权方面来衡量,都是后者占有明显优势。

文学图书选题值得注意的问题:

1. 翻译作品数量急剧下降。

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学翻译工作成绩斐然,国外文学名著几乎都及时地翻译过来了。但这二年来翻译作品数量骤减,这既不利于中国文学的发展,不利于借鉴外国好的文学成果,也不利于改革开放,不利于深入了解世界的发展与变化。这一点我们应予以特别的关注。在所报来的文学类选题中,外国当代文艺作品的选题不到100个,有的文艺社过去以出版翻译作品著称,今年也只安排了几种选题,如有一个较有影响的地方文艺社,1993年外国文学选题60余种,今年仅有6种。照这样下去势必导致图书结构的失调。

翻译作品中名著的大量重复出版值得注意。如《红与黑》已有13个译本,《呼啸山庄》和《简·爱》也有六七个译本,它们在质量上不见得超过傅雷、杨绛等名家。这样做恐怕不是明智之举。也有人认为,这是出版社在“跑马圈地”。

2. 小说创作中的性事描写过多过热。

我们不是一概反对性事描写,问题在于怎样写,写到什么程度。有的书中根本无需写什么性事,作者却去着力渲染,显然是另有所图。

3. “明清艳情小说”热。

所谓“艳情小说”即夹杂有色情描写的古小说。这类书在清代即曾被查禁。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管理部门对此类书一直持严肃慎重的态度,但1993年,几家出版社不经报批,安排了此类选题多种,而且都以“足本”“全本”自称。这类书中有许多露骨的性描写,对读者特别是对青少年读者身心健康不利。新闻出版署去年发了一个文件,规定了这类图书的出版要专题报批,并且开列了书目,一定要切实执行。

4. 港台图书的选题仍需要履行报批手续。一些出版社采取“先斩后奏”的做法,扰乱图书出版的管理工作。今后此类选题仍旧要实行专题报批、严格审核的制度。

(三) 少儿类图书选题的优势及其不足

少儿读物是我国出版界成绩比较突出的一块,近几年进步尤其明显。1994年少儿出版社的选题计划,内容丰富,颇成气候。从整体规划上看,少儿社选题可谓琳琅满目,各有千秋。真可谓“小读者,大世界”。从已到的选题分布来看,各社多能根据自身的特点,进行规划。选题多的高达700多种(含重版书),少的只有30余种。已到选题的出版社有25家,共申报选题约3000多种。平均每个社的选题约120种。其中重点图书约250种,占整个选题的83%。

综观这些少儿选题,有以下几个特点:

1. 丛书、套书蔚蔚壮观

1994年少儿图书选题,几乎每个少儿出版社都安排了大部头的丛书、套书。这些选题既有系统,又有针对性,尤其是少儿百科方面的套书、丛书较多,而儿童文学、低幼读物,也多是以丛书、套书的形式出现。这类图书选题约占整个选题的40%,如果不算教材、课本类图书,便可达到90%以上。

2. 文化积累性图书仍占较大比例

这一类选题,在整个少儿图书选题中约占85%。除了上述的套书、丛书多是文化积累方面的选题外,还有相当比例的课本、教材和辅助读物。除此之外,则有10%的选题属于创作类。

3. 重版书比例较大,选题趋向成熟

少儿图书选题中,约有30%以上是重版书。有的出版社甚至达到50%以上。如:明天出版社1994年少儿选题有699种,其中再版图书达383种,再版率高达54%,是少儿出版社选题再版率最高的出版社之一。这说明少儿图书的选题较为扎实,有生命力,适合图书市场的广泛需求,呈现出一种趋向成熟化的态势。

尽管少儿图书选题比较丰富,也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和不足的地方。

1. 文学创作的选题仍是薄弱环节

文学创作方面的选题是少儿出版社的一个薄弱环节,当代题材的儿童文学创作更少,应该集中研究,进行攻关。

2. 知识读物中的科学幻想作品少

知识读物中优秀的科学文艺作品少,科学幻想作品更少。这不能适应四化的需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让孩子们展开科学的幻想翅膀,奋力飞翔,对于培养一代新人,大有好处。

3. 大部头“套书”、“豪华本”丛书太多

少儿图书越来越豪华,越来越高档,套书、丛书大量增加。少儿图书还是应该“小”一点、“薄”一点、实用一点。第一,让孩子们拿得动;第二,使孩子们买得起;第三,孩子们看一会儿就可以看完。

4. 少儿图书“成人化”现象仍很突出

从以往的少儿图书中发现,少儿图书“成人化”现象比较严重。有些书的读者对象并非是少年儿童,而是有钱又有闲的成人。1994年少儿选题中,“成人化”现象仍旧存在,集中表现在一些古文今译、依据名著编绘的套书选题中。少儿出版社应该时刻提醒自己,少儿图书的读者应是求知欲旺盛、理解能力有限、购买依靠父母的少年儿童。

(四) 科技类图书选题的状况和建议

科技类图书的出版是图书出版中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已审读的91家科技出版社选题,总计有18857种,占有图书选题的31.5%,平均每社选题有207种,超过了全国出版社平均数。

科技图书出版形势非常好。党中央明确提出我们的一切工作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小平同志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述,给科技出版工作以巨大的推动;国际国内的形势,高科技在军事上的应用,给人以震撼,让人深思。适应这种形势,新闻出版署及时提出科技出版社要“立足本专业,面向大科技”的要求。这一重大决策,大大解放了科技出版的生产力。1994年科技图书选题正是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产生的,带有明显的时代特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 促进科学技术的应用推广,促进科学技术直接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图书占主要部分。配合“科技攻关计划”、“星火计划”等较大规模的国家科技活动,大批不同层次的应用技术图书选题列选。

2. 高科技著作依然是科技出版社的重点图书,在出版的资金、质量和时间上都予以保证。高层次的科技著作出版难是科技出版界的一个突出问题,几年来,陆续有20余家科技出版基金相继建立,为缓解高层次的科技著作出版难起到了重大作用。今年将要出版的高层次科技著作约有900余种(其中有100余种由基金资助)。

3. 科技出版社执行立足本专业,面向大科技的政策后,大大拓宽了选题思路。围绕本专业分工,开拓相关相近的选题,眼界更宽,系统化更强。

此外,纵观整个选题,我们建议科技出版社在如

下三个方面要引起注意:

1. 生活类图书选题安排过多,热度不退,应该注意调控。如室内装修、时装菜谱、美容美发、健美长寿等等,不但造成浪费,还会影响重点图书的出版。从图书的结构看,我国高水平的科技学术著作偏少,只占科技图书总量的10%左右,而生活类用书不少于20%。相比较,美国生活类图书只占5%,英国占6%。结构上的差异,说明我国科技图书的整体学术水平,亟待提高。

2. 翻译图书品种继续下降,近年来尤其明显。前几年,科技方面的翻译著作一般占科技图书年度出书总量的20—30%,1994年下降到5%左右,形势严峻。我国的科技水平在很多方面还是落后的,通过翻译国外的科技著作,引进国外最新科研成果,洋为中用,十分必要。科技出版社应该从大局着眼,尽量调剂资金,努力改变这种状况。

3. 科技出版社执行“立足本专业,面向大科技”的政策,首先要牢牢把握住“立足本专业”。如果忽视了这一点,本专业分工图书不占主体,出版社就会失去个性和特色,失去竞争能力。

总览1994年图书出版选题,令人振奋,令人高兴,但其中仍然不乏引人警惕注意之点。各出版社应该不断研究新情况、新问题,优化选题,调整结构。在图书内容方面,要大力弘扬时代主旋律,宣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宣传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宣传人民群众从事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创造精神,宣传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宏伟事业,作出我们应做的贡献。

(原载《新闻出版报》1994年4月11日)

总论 1994 年中国出版业的深刻变化

晓 宏

1994年的图书出版,虽不是石破天惊,但这短短的一年之中却发生了许多对图书出版而言是重大的、里程碑式的事件,足以让人们记忆隽永。

最深刻的是图书出版“观念”的变化

观念是人们对事物的态度与看法,观念又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指导人们实践的一种思路与认识。对于图书出版的实践来说,观念是至高无上的。

图书出版的“观念”,最重要的是在于如何为自己“定位”,亦即如何确定自身的性质、地位、任务,这是指导出版实践的根本与出发点。不同的观念,不同的定位将推演出截然不同的图书出版发展模式。

近年来,关于在图书出版的“观念”或“定位”方面,典型的争议是:图书是商品,抑或不是商品;出版社是企业,抑或不是企业。这个看似简单明了的问题却引得人们执着争论10多年而不休,仅仅把它解释成人们的理论兴趣是很不够的,问题的要害是人们期望通过在理论上、观念上的界定,为自己的出版实践树起一杆旗帜来,以作为出版活动的出发点和根据。观念和认识上的差异并没有停留在理论和观念范畴,也反映在出书活动之中。近几年来,有的出

版单位就是简单地按照企业的原则、图书是商品的原则从事出版活动,按此观念指导,“市场需求”和“读者需求”就成为确定选题、出版图书的最高原则,但是,与物质产品的要求不同,图书的市场需要和读者需要是存在良莠之分的,有健康的文化需求,也有不健康的文化需求。而出书又不加区分,造成一些低级庸俗图书拥入文化市场,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现象了。可以说,对图书出版的“观念”认识不清,是出现问题的重要原因。

1994年,图书出版的观念发生了什么变化呢?1994年召开了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会上,江泽民同志明确提出:宣传思想工作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这四项基本任务的提出,对图书出版起到了统一认识,明确出书指导思想的重要作用。图书出版中关于商品、非商品,企业、非企业的争议似乎偃旗息鼓,人们终于想起来应该换一个角度来考虑一下图书出版的“观念”问题。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之后,出版界不约而同地召开了一系列重要会议,主旨就是以江泽民同志提出的四项基本任务为主题,研究如何规范和确定出书的行为

和指导思想。这些重要的会议有:南宁的全国人民出版社社长总编辑会议,珠海的文艺出版社社长总编辑会议,厦门的全国高校出版社社长总编辑会议,新疆的全国科技出版社社长总编辑会议,天津的全国少儿出版工作研讨会,北京的全国民族出版社社长总编辑会议,等等。这些会议,对于明确出书任务与方向,对于认识并深化图书出版的“观念”,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这种思想观念上的认同也渗透到出版实践活动之中,已开始对出版实践产生重要影响。可以说,1994年出版界在观念上的变化是最深刻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还带动了其他具体方面的许多观念的变化。

数量与质量,孰轻孰重?

“数量第一”的观点曾经指导了我国的生产实践近20年,当我们回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后,“数量第一”的观点仍有相当的思想基础,并在自觉与不自觉之中作用着实践活动。从图书出版的情况来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发展速度很快,这主要是由于“文革”期间停滞发展多年之后造成了很大一块空白,又由于人们在改革开放之后迸发出了极大的热情与能量,因此,在一定时期内,出版工作的规模与速度增长迅速应属正常。但是,如果不停顿地把这样的高速度一直保持下去就会出现问題,当我们在为近10万多种书的成绩沾沾自喜时,质量方面反映出来的问题是严峻的。其一,图书质量普遍滑坡,据新闻出版署组织专家对部分出版社的部分图书质量抽查的情况看,编辑质量不合格的图书比例平均不低于80%,让人触目惊心;其二,数量与规模的安排已超出出版社的实际承受能力,出版活动“体外运作”的现象,买卖书号的现象在去年还不能称之为个别现象,有的编辑,年发稿量竟达2000万字以上,有的几十人的出版社年出版图书几百种;其三,重复出版和平庸书大量出版的问题十分严重。诸如党史、哲学、经济等方面的书,重复不是几十种、几百种,而且成千上万种,大量的重复,使得难以集中起一流的作者,书稿质量首先就打了一个很大的折扣,在编辑、印制、校对方面仍然存在类似的问题;近10万种书中究竟有多少种平庸之作,虽然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但社会普遍认为,其比例不会小于重复出版的数量。假如把二者合起来,由此造成的社会性浪费是惊人的,如果减少百分之十的品种,而总印量仍维持在原水平上(从近10年的情况看,图书品种增长的速度虽然很快,但总印量并未能相应增长),从社

会宏观来看,仅此一项节约的费用起码上亿元。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仍然有的出版社不顾实际出书能力,提出“日出一书”的口号。

在这样的背景下,新闻出版署从出版的战略指导思想上提出,要实现从数量增长向质量效益的阶段性转移的目标。这一战略目标自1993年末提出,并未立即得到所有人的认同。改革开放以来,发展速度一直是衡量事业发展的标志,提到出版繁荣,首先让人们想到的是中国出书年近10万种,已毫无愧色地跨入世界出版大国的行列。审视问题的单一性使人们忘记从多个角度衡量出版繁荣。

从现阶段看,由于这些年数量的快速增长,着重地强调质量就显得必要和迫切,这是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确定的,是为了保护出版的持续稳定发展。由数量增长向质量效益的阶段性转移,在1994年得到普遍认同,并得以推行。据了解,1994年全国绝大多数出版社制定了新的质量检测规定,许多出版社聘请离退人员成立了专门的质量检查小组,并实行奖优罚劣制度。浙江、山东、辽宁、上海、陕西、广东、四川、湖北、天津等十几个省、市开始组织对本省市图书的质量检测。

阶段性转移的思想和质量第一的思想在1994年可以说已深入人心,其根源在于,这一战略指导思想于出版有利,于出版社有利,于编辑有利,更重要的是于社会有利,于读者有利。这是它能够得到社会拥护、出版界拥护的根本所在。如何把它坚持下去,切实取得成效倒是应该研究与重视的新问题。

书号控制——观其利弊,择善从之

对书号实行限量使用的办法,始于1994年。对于这一举措,不仅出版界有所议论,即便是在出版管理部门内部,也存在一些思想上的顾虑,要不要对书号限制使用,曾反复商研,主意难定。这件事情为什么这样举棋难定呢?一方面是怕被人们视为又回到计划体制的老路上去;一方面在于出版界从来没有这样做过,即便是在计划经济时期也未限制过出版社的书号,在书号范围内应是一件未曾有过的事情,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有些出版社自主决定出书数量惯了,很不愿意再多一项制约。

但是不这样搞又确实别无良策。关于压缩出书品种问题,在几年前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就提出“压缩品种,优化选题,调整结构,提高质量”的十六字指导方针,但是从这几年的实践情况看,品种不但没有得到压缩,反而逐年上升,且上升比例还挺大,这是为

什么?其中原因有多方面的,比较复杂,如果说出版社缺乏自我约束机制,但是在整体制约机制未良好运转时,实际情况可能是一些自我约束好的出版社吃亏,而那些缺乏自我约束的出版社却得到便宜,这就显得不合理了,于是大家互相攀比,争相出书,广种薄收,以致品种的增多并未带来印量的增多,图书出版陷于盲目大量出书的劣性循环之中。

在这样的情况下,限制还是不限出版社的书号使用量,没有一种方法是完美的,但是,观其利弊,在现阶段,采取出版社限用书号的办法不一定是最佳方法,但对出版整体是有利的,不这样做,喊了多年的“压缩品种”可能仍将压缩不下来,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将影响到从数量增长向质量效益阶段性转移的大局。

限制书号的使用量,出版社抱怨也好,不理解也好,冷静下来思考,普遍承认这一举措在全局角度看是有益的,是控制数量,提高质量的有效办法。从对书号实行限量调控的实践看,虽然其中存在一些不足与问题,但效果仍是十分显著的,最值得一提的是,出版社粗放式出书的作法得到扭转,书号少了,不能敞开使用了,只能在精耕细作上下功夫。据估计,1994年的出书品种按1993年的统计数下降不多,但实际出书数量要比1993年实际出书量下降2万种左右,这是由于出版社1993年报送出书统计有遗漏的原因。

繁荣并不表现在地摊和地下

曾几何时,地摊文学充斥市场,地下的非法出版活动异常频繁,不仅在昏暗的路灯下,就是大街闹市,也时而有书贩向路人大声叫卖那些充满挑逗性文字和画面的图书、杂志,不法书商更是在借此赚得大把昧心的票子,这是那些书商、书贩和读书品味低下的人所期待的“繁荣”,是不能暴露在阳光之下的“繁荣”,是地下的“繁荣”,是为了图书繁荣而必须扫除掉的“繁荣”。由于非法出版所得到的巨额利润,使一些不法书商不惜铤而走险,他们金钱开路,专门寻找出版部门的薄弱环节,买书号出书还是“温柔”的一类,有些专门干盗印出版和非法印制黄色淫秽图书的勾当,有的城市仅3—5个月就发现非法印制的黄色淫秽书200多种,这无异是在精神上杀人越货。

1994年的打非扫黄工作比任何时候都显得重要和紧迫;同时也比任何时候都做得扎实有效。首先是在全国大中城市进行的图书市场清理检查工

作,这项工作重点清查的是地摊、书摊和二渠道,有问题、格调低下的图书坚决不允许上市,并且坚决取缔非法的地下交易,不法书商和书贩们终于发现,昧心钱不像以前那样好赚了,而且是要为其付出沉痛的代价的。震惊全国的“9·18”非法出版大案的破获,成为一个契机,打非扫黄工作乘势而上,进一步扩大了战果。1994年的全国扫黄工作会议,被认为是一次高层次的扫黄决策与协调会议,党和国家以及各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使扫黄工作不再像以前那样,扫完以后又卷土重来,且来势更猛,被人称为“越打越黄、越黄越打”。在全国扫黄工作会议之后,打非扫黄工作在向治本和根治方面扎实进行,对涉及到全国性的大案立专案,抽调精干力量专案侦破;对全国近10万家印刷厂开始实行重点清理整顿;对二渠道进行清理整顿,规范其行为;对书刊批发市场强化管理,实行批发进场,坐商归市。这些治理措施虽仍在进行之中,但是图书市场和书摊上的面貌已清爽了许多。低级的、不健康的读物已基本消除在公开的场合,但是,在地下,仍有人在冒险兜售黄色、淫秽出版物。进一步的任務应该是彻底取缔它们,或从宏观治理上把它控制在最低水平。

客观地讲,问题并不全部出在不法书商和二渠道身上,正式出版社有的也在违法出书,买卖书号的问题,自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发出严禁买卖书号通知之后,经过出版社的自查自纠,又发现个别出版社有新的买卖书号行为,为坚决刹住这股歪风,国家出版部门对其实行了严厉的制裁措施,不仅让这些出版社在经济上得不到任何好处,还要对出版社实行整顿或停业整顿,并且追究了有关责任者的责任。

挂历问题在1994年也得到了彻底治理。这是一个存在多年,但一直没有解决好的问题。原来一直由出版社出版、新华书店经销挂历,已快要被二渠道全面占领,关键的问题还不在于此,问题的根子在于,二渠道以高定价、低折扣的不正常经营方式占据了市场,在挂历画面选择上,越来越“露”,穿的越来越“少”,一到年末,满街挂的都是近似裸露的美女。而挂历的消费,又大都是公费购买,其不合理之处就越发明显。老百姓对此极为不满,辛辣地批评“不能再让美女在秋风中萧瑟了”。

为了维护国家的利益,为了维护消费者的利益,国家出版管理部门作出对挂历实行最高限价和限发行折扣的规定,对画面不洁的挂历禁止出售。这一举措,得到了广大群众的好评。

一切为了多出好书

图书出版所做的一切工作,归根结底是多出好书,这是检验出版工作的根本标志,也是衡量出版繁荣的根本标志。1994年的图书和图书出版活动,是大收获、大展示的一年,限于篇幅,我们只能从中撷取很小的一部分作些介绍,并期望起到窥一斑而见全貌的作用。

——《邓小平文选》第一、二卷修订版的出版,标志着代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著作配套出齐。这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如果说《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集中反映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理论,那么修订再版的《邓小平文选》第一、二卷则真实记载了这一理论形成的过程。值得一提的是,修订再版的一、二卷在编校质量上达到了“一字一点”无差错的最高水平。

——《汉语大辞典》12卷出齐。这是建国以来,继《中国大百科全书》出齐之后,另一部最重要的辞书工具书。该书收词375万多条,5000万字,插图2200幅,被誉为我国辞书史上的典范和里程碑。在该书出齐的庆功会上,江泽民、李鹏等中央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参与编纂、出版的主要人员,亦为图书出版的殊荣。

——国家“八五”重点图书规划的实施进展顺利。国家“八五”重点图书规划,共收入重点选题1138种,总卷册逾万册,由全国近400家出版社共同承担。规划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项出版活动,它充分展现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版的实力与魄力。规划始于1991年,1994年国家新闻出版部门对规划的实施情况进行了全面检查,检查结果表明,规划实施顺利,已出书比例达67%,预计到明年底,将有94%的选题完成出书任务(含8%的大型选题将延续到“九五”)。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已出版300种。商务印书馆安排的这套丛书,始于拨乱反正之后,由于历史原因,人为地留下了很大一块文化空白,这套丛书可以说起到了填补这一空白的主力军作用,在文化界、思想界影响颇大。这套丛书今后将长期出版下去,它为中国了解世界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10卷),该书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纂,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是建国以来第一部系统公布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前党和国家重要文献的大型丛书。该丛书对于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经验教训具有重要的文献参考价值。

——《巴金全集》26卷本,该书收入作者自1921年以来除译文以外的全部著作及书信、诗文,是我国出版界的惟一健在作家的全集。

——第五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该博览会是我国举办的最重要的国际博览会之一,这一届国际图书博览会共吸引了38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出版社参展,展出图书达9万种,其中海外原版书达3.5万种,在参展国家与地区、参展出版社及图书品种,以及版权贸易金额等方面都超过以往四届,获得了很大成功。

——第六届全国书市在武汉举行。这届书市盛况空前,规模超过以往历届。场馆占地面积13300平方米,共陈列7万多种境内外图书、期刊等出版物,订货码洋达2.2亿元,销售2000多万元。特别是展示馆中荟萃的3000余种精品图书,充分展现了图书出版繁荣的新面貌。

——送书下乡活动受到社会重视,深受农民欢迎。这项活动于1994年底至1995年初展开,活动的主办者是中央宣传部、农业部、国内贸易部和新闻出版署。4家商定,共选出适合农村需要、实用性和操作性强、价格适当的图书300种,其中农村类图书占60%,送书下乡。为解决农民看书难、买书难问题带了个好头。

——《出版法》完成立法程序,提交全国人大审议通过。这是1994年出版最为重要的、最能够激动人心的事情。法是一个行业发展与成熟的标志,同时又是规范行业行为的规则。《出版法》如能出台,必将从总体上对各项出版规章作一个梳理,必将对图书出版繁荣起到巨大的保障作用。

在新的一年到来之际,图书出版,请记住金色的1994年。

(原载《中国图书评论》1995年第1期)

图书出版评述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类图书出版综述

俞思念

本年鉴收入 1994 年出版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类图书计 67 种,选题比较广泛,内容也很丰富,反映了这一领域里的研究成果。总的来看,这一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类的图书出版,有如下可述可议的地方: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出版发行稳步发展

马恩列斯著作在我国的翻译出版是一项有计划、有步骤的工作,新的版本正在编译和筹备中。《毛泽东选集》第二版于 1991 年出版后,在近年的书市中仍占有引人注目的地位。1993 年《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出版,在全国形成了学习的热潮,并进一步持续发展。特别是《邓小平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在本年度印行第二版,再次推动着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活动的开展。到 1994 年底,《邓小平文选》印行总数突破 1 亿册,充分说明人民群众对这一学习活动的自觉性和广泛性。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出版与发行在我国具有特殊的意义,这一类著作是图书出版的常备书籍,因而需要有一定的储备。近年来,为配合学习邓小平著作,对马列著作的需求也有所增加,有些学校和一些理论工作者开始抱怨不易买到马列原著,这种现象应当引起出版界的注意。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具有较高水准

我国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一向十分重视,每年都有一批新著问世。本年度出版的《人的世界与世界的人》、《剩余价值理论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文艺学体系》、《马克思恩格斯军事哲学研究》、《马克思东方社会理论》等,亦是近年来具有较高水准的研究成果。但从总的来看,这方面的研究与出版还有一些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方,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出版应有一个科学的总体规划。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从 1989 年开始陆续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黄楠森等主编,北京出版社出版)一书,

1994 年出了第 4 卷(预计共出 8 大卷,400 余万字)。该书集中了一群悉心治学的专家,是一部很有份量的大作。如能隔几年就出一些这样的研究成果,这才是改革盛世的气象。我们期待着以后会有更多的,足可流传于世的宏篇巨制问世。

三、有关毛泽东思想研究成果的出版令人瞩目

1993 年是毛泽东诞辰 100 周年,有关毛泽东研究的许多成果在 1994 年仍占相当份量。同时,由于毛泽东在百年中国的地位与历史作用,作为一代伟人,他在政治、经济、军事、文艺、外交方面的建树和在社会生活上的传奇色彩始终受到出版界的看重。所以,本年度出版的《毛泽东的世界丛书》、《毛泽东经济思想与当代中国》、《毛泽东外交思想研究》、《毛泽东建党思想史记》、《毛泽东财经思想研究》、《毛泽东军事年谱》、《毛泽东新闻思想研究》等,都是有一定深度的研究成果。李君如所著《毛泽东研究三部曲》之一的《毛泽东与近代中国》,是一部颇有特点的新作,其独辟蹊径的研究方法是值得称道的。

而另一类关于毛泽东研究的作品如《毛泽东诗词鉴赏》、《毛泽东诗词艺术》、《毛泽东和中国文学》、《书家毛泽东》、《毛泽东读古书实录》、《毛泽东手书选集》等,则再次迎合了广大读者欣赏毛泽东独有的艺术思想的需要。这一类图书的版本还为数不少,这也反映了毛泽东在中国人民心目中所具有的永恒魅力及在世界上的广泛影响。这一现象应引起理论研究者和出版者的关注。当然,这一类的图书已经出得比较多了,但可以考虑在书籍的印制上更精美些,以满足一些读者的收藏愿望。

有必要提到的是,北京大学图书馆编纂的《毛泽东选集索引》(人民出版社出版),是一本极有价值的工具书。它以《毛泽东选集》第二版为底本,以书中关键词为主题索引,对研究毛泽东著作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随着对毛泽东研究的深入,关于毛泽东的传记、诗词、读书批语、外交战略、人事交往等,都应给予深入研究并精心策划,这是出版工作中既有社会效益、又有经济效益的选题。

四、邓小平研究逐渐成为新的热点

邓小平研究包括两方面:一是邓小平生平事业,二是邓小平有关思想。

邓小平实事求是,大智大勇,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其生平事业在中国人民心中树立起一座巍巍丰碑。认识邓小平生平事业,对深入理解其思想和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的伟大实践是十分有益的。本年度出版的《邓小平在太行拾录》、《我眼中的邓小平》、《邓小平与中国》、《中国第二次革命的伟大开端——邓小平在1978》、《巴蜀情——邓小平与四川》、《邓小平与广西》、《总设计师和他的工程》等书,生动地记述了邓小平在各个时期的业绩、思路、工作与风采。

对邓小平有关思想的研究,包括十分丰富的内容,并且与各方面的实践结合起来,展现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这一类著作有《邓小平治国韬略》、《论邓小平人民民主专政思想》、《邓小平青年思想研究》、《邓小平法学思想论》、《邓小平教育思想研究》、《邓小平管理思想研究》、《邓小平思想通览》、《邓小平经济思想的渊源与发展》、《邓小平军队现代化建设思想研究》、《邓小平新时期军事思想研究》、《邓小平战略思想论》等,其共同点是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时期出发,深刻地阐发了邓小平思想的创造性和对于实践的指导意义。它既表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各条战线的胜利,也表明人民群众在实际工作中的认识和对理论研究的推进。

在邓小平有关思想的阐发上,还有一批书目是从各地的实际出发来论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如《邓小平理论与广东实践》、《邓小平理论与实践研究丛书》、《邓小平理论与海南特区实践》等。这些书在总结经验中学习,在运用理论中提高,表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自觉性,表现了邓小平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与理论联系实际学风。应该说,某一地方的成功经验,也是对全局与整体的印证,是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挥和发展。这一类的图书今后还会增多,其无疑是应予以大力支持的。

值得注意的是,本年度有关邓小平研究的论著,已经开始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称作为“邓小平理论”(如人民出版社1994年4月出版的《邓小平理论研究》一书),这为邓小平理论概念的提出作了前期论证和思想准备。

综上所述,1994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类图书的出版工作取得了应有的成果,是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这一伟大理论的发展相适应的。但从图书出版工作的进一步要求来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类图书的出版还有许多需要提高的地方。最主要是,在这一类图书的出版上也要树立精品意识,选择一批具有保存意义和长久价值的书目,逐步推出、不断修订、精益求精。可以考虑组织若干理论班子和写作队伍,长期合作,持之以恒,完成计划。图书出版是理论研究工作和文化建设事业的缩影。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类图书出版的成绩与不足,也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的动向,因而应引起理论工作者和出版工作者的特别注意。

哲学类图书评述

李维武

1994年出版的哲学类图书,从收入本年鉴的书目看,可以说收获不小。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面,出版了一批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的专著及译著,如马泽民著《马克思主义哲学前史》(重庆出版社)、赵修义等著《马

克思恩格斯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黄楠森等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第4卷(北京出版社)、马尔科维奇等编《南斯拉夫“实践派”的历史和理论》(重庆出版社)。这些著作的出版,进一步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的研究空间,深化了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最能反映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新进展的,是著名哲学家冯契的论文集《智慧的探索》(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这本论文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冯契晚年哲学探索的足迹和他力图重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努力。论文集的最后一篇《智慧的探索——智慧说三篇 导论》,阐发了他的“智慧说”的思想来源、基本思路及内容梗概,初步展现了他所建构的中国化和个性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冯契的《智慧说三篇》,由《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逻辑思维的辩证法》、《人的自由和真善美》三书组成,这些著作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于1996年作为《冯契文集》前3卷出版。

中国哲学的原典与研究著作,在1994年仍然是哲学类图书的一个重点。人民出版社的《中国大哲学家研究系列》,是一套受到中国哲学研究者们好评的丛书。这套丛书并不追求时下盛行的一次性“隆重推出”,而是努力实践“积水成渊”的精神,一本一本地出版有质量的中国哲学研究专著。继陈来著《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于1991年问世后,这套丛书在1994年又推出了周桂钿著《虚实之辨——王充哲学的宗旨》和李明友著《一本万殊——黄宗羲的哲学及哲学史观》两种。日本学者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中国学者吕宗力等校的《纬书集成》(河北人民出版社),是一部大型的纬书辑佚汇编。纬书作为汉代经学的产物,在其神秘主义的色彩下,不仅包括了对儒家经书的解释和发挥,而且包含了许多古代自然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内容。汉代以后,纬书逐渐散佚,后有明清学者辑佚钩沉,但仍缺少总结性汇编工作。这套《纬书集成》,可以说弥补了这一缺憾,为深入研究汉代经学史、哲学史、思想史、科技史、社会史提供了方便的资料来源。杨向奎撰《清儒学案新编》(齐鲁书社),是对清代思想史、学术史研究的一大贡献。民国初年,徐世昌曾主撰《清儒学案》,但由于假手众人,取舍不严,缺乏学术思想内容,因而不为学术界重视。《清儒学案新编》则直承黄宗羲撰《明儒学案》的传统,由撰者一人独立地对有清一代思想学术进行清理分疏,上起明清之际,下至19、20世纪之交,列120人学案。每一学案分案主评传和学术思想资料选编两部分,以起到清代学术思想史与学术思想资料选编的双重作用。全书8卷,400余万字,从1985年出版第1卷到1994年8卷本出齐,真可谓“十年磨一书”。在20世纪中国哲学家著作中,有熊十力论著集之二《体用论》(中华书局)和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13、14卷(河南人民出

版社)出版,为研究这两位大哲学家在1949年后的思想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资料。此外,还有一批研究中国哲学的专著值得重视,如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隋唐卷(人民出版社)、杨国荣著《善的历程》(上海人民出版社)、徐梵澄著《陆王学述》(上海远东出版社)、沈嘉荣著《顾炎武论考》(江苏人民出版社)、刘邦富著《梁启超哲学思想新论》(湖北人民出版社)、胡伟希著《金岳霖思想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张祥浩著《唐君毅思想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乌兰察夫等著《蒙古族哲学思想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等。在中国哲学研究的工具书方面,有两种中华书局出版的索引值得重视,一是方克立等编《中国哲学史论文索引》1—5册,另一是程湘清等编《论衡索引》。

在西方哲学方面,一些现代西方哲学代表作的中译本相继出版,如上海译文出版社就出版了胡塞尔的《逻辑研究》第1卷、加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阿佩尔的《哲学的改造》等;一些较有功力的研究专著也相继出版,如吴国盛著《希腊空间概念的发展》(四川教育出版社)、董光璧著《马赫思想研究》(四川教育出版社)、涂纪亮主编《现代欧洲大陆语言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郑文辉著《欧美逻辑学说史》(中山大学出版社)等。这些译著和专著的出版,显示出中国哲学界研究西方哲学的兴奋点已移至现代西方哲学上。

美学与伦理学的研究著作也很有特点。对现代人类生存状态的深入思考,特别是对中国社会转型期人们生存状态的认真探讨,成为本年度美学、伦理学著作的一个重点。刘小枫主编《人类困境中的审美精神》(知识出版社),精选了由鲍姆加登至哈贝马斯共42位世界著名哲学家、诗人论美文选45篇,凸出了美学对生存论问题的关心和思考。仪平策等编著的《泛美学丛书》(春风文艺出版社),包括《美学与两性文化》、《美学与市场营销》、《美学与电子文化》、《美学与社会犯罪》4本书,以“泛美学”的观点探寻现代社会的文化特征,内部都与社会转型期人们所面临的诸多生存问题相关联。伦理学的研究著作可以说更集中在社会转型期如何转化传统资源、建设现代伦理这一紧迫问题上,如万俊人著《伦理学新论——走向现代伦理》(中国青年出版社)、何怀宏著《良心论——传统良知的社会转化》(上海三联书店)、赵春福等著《伦理精神与中国社会现代化》(北京出版社)。

宗教问题,自80年代“文化热”以来,渐成研究

热点;而自冷战结束后,更成为全世界所关注的重大问题之一。这无疑导致了近年来宗教问题类图书的猛增。从本年鉴的书目看,在1994年所出图书中,宗教问题类图书占很大份量;一些非专业学术出版社,也花大气力出版此类书籍,如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就出了一套《佛学丛书》,重刊各种佛教经典。可以说,在本年度中,与中国历史和现实相关的主要宗教都有研究著作问世,其中不乏深入探讨、专门研究之作。以佛教为例,有原典的点校新刊,如萧父等点校的《古尊宿语录》(中华书局);有要籍的选择汇编,如苏渊雷等选辑的《佛藏要籍选刊》(上海古籍出版社);有宏观研究的专著,如郭朋著《中国佛教思想史》(福建人民出版社);有专题探讨的成果,如皮朝纲著《神宗美学史稿》(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还有对寺院文化的考察,如段玉明著《中国寺庙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些藏传佛教文献也得以整理出版,如青海民族出版社出版的藏文版格桑确吉嘉措编著《释迦牟尼大传》、阿底峡著《阿底峡传》。至于其他各大宗教,有关图书亦很多:道教研究有中国道教协会等编《道教大辞典》(华夏出版社)、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1—4卷(上海知识出版社)、汤其领著《汉魏两晋南北朝道教史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等;伊斯兰教研究有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编委会编《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四川辞书出版社)、南文渊著《伊斯兰教与西北穆斯林社会生活》(青海人民出版社)等;基督教研究有杨天宏著《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民众宗教意识问题也开始有专书探讨,如侯杰等著《中国民众宗教意识》(天津人民出版社)。对于西方宗教问题研究,也在逐步深入开展之中,吕大吉著《西方宗教学说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柴惠庭著《英国清教》(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就是这方面的新作。

从本年鉴的书目中可以看到一个值得重视的出版现象:有关卜筮、咒语、术数、风水之类神秘文化的图书正成热门。如广西人民出版社,在1994年就出了一套《中华神秘文化书系》,包括《神秘的五行》、《神秘的占候》、《神秘的术数》、《神秘的八字》、《神秘的符咒语》诸书,又出了一本《天国大智慧》,专论宗教谋略与方术谋略。相比之下,有关对科学进行哲学反思的书目,本年鉴则收录较少。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出版社在1994年就很少出这类书。如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张巨青等主编的《认知与方法丛书》第2辑,包括《真理——科学探索的目标》、《科学思维的辩证模式》、《科学美学》、《科学思维的推理艺术》、《中国传统科学方法的嬗变》、《现代社会中的科学》、《生存的沉思——当代科技进步与全球问题》、《科学法学·科学伦理学》8本书,就是对于科学作哲学反思的系列著作。又如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罗杰·彭罗斯著《皇帝新脑——有关电脑、人脑及物理定律》,也是这类值得一读的译著。然而这些都未能在本年鉴的书目中反映出来。我们希望在以后的年鉴中,能多看到一些这方面的书目;也希望有关的出版社,能积极地为年鉴提供这方面的书目。

谈到1994年出版的图书,还有一本值得一提,这就是《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顾准并不是一位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家,但却是一位独立探索的思想家。他留给后人的,不仅是思想的火花,而且是探索的勇气。而这些都在这本文集中保留了下来。当回首20世纪下半叶中国思想史时,我们是不能忘记这位思想解放的先行者在那个教条主义盛行的年代里所作的勇敢探索的,当然也是不能忘记这本《顾准文集》的。

社会科学总论类图书评述

詹德优

1994年出版的社会科学总论类图书,本年鉴共选收101种,除丛书和个人文集外,主要是有关管理学、社会学、人口学、人才学等学科领域的著作。

诸多知名人士个人文集的出版,是本年度社会

科学总论类图书出版的新景观。其中有被毛泽东评价为党内最懂农民运动者之一的王观澜的《王观澜文集》,该文集精选了作者生前留下的“有历史价值,能给人启示”的55篇文稿;著名外事活动家宦乡的

《宦乡文集》,收录作者具有代表性的论文和讲话 168 篇,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诸多领域;将军、外交家、艺术家黄镇的《黄镇文集》,收入作者所经历的军事战线、外交战线、文化战线和第二线的重要著述 100 余篇,大部分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德赛二先生与社会主义——陈独秀文选》则收录陈独秀的代表作数十篇,内容主要集中于“五四”前后对新文化的鼓吹、特别是对科学与民主的倡导,建党前后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和宣传,以及较后时期一些有真知灼见的作品。

《七缀集》(修订本)是著名作家与学者钱钟书自编的学术论文集,共收录论文七篇,以艺术与文学、中西文化的对照,结合具体作品、作家和文艺现象的分析,探讨文学创作、翻译的规律及文艺批评应取的标准,阐述中外文化的交流与影响;文艺美学家宗白华的《宗白华全集》,收作者文学创作、学术著作及翻译文稿,其中有与郭沫若、田汉合作的《三叶集》、有被称为“比较哲学的经典之作”的《形而上学》和中国最早的三部美学专著《美学》及两部《文艺学》,有一半作品是首次面世。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的《芳草天涯——费孝通外访杂文选集》,收文 44 篇,时间跨度从 20 世纪 30 年代至 80 年代,地域包括英、美、澳、日等国。生动记述了西方人文景观、科技成果、社会问题,分析了中西文化的差异、交流和冲突,记录了作者的心路历程。

社会学图书的出版,在 1993 年的基础上有新的发展,本年鉴收录 25 种,约占收录总数的 1/4。其中有社会学理论探索的著作,如《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思潮》以社会走向问题为中心线索,把当代各种社会思潮连为一体,综合地进行评析和介绍。《社会学概论新修》围绕“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这一主导观点展开论述。《社会变迁与社会协调发展理论研究》论述了当代中国社会的改革与社会变迁,以及评述了西方社会学的理论观点。论述人类学和民族学的著作,如《无助——从无助到自助的哲学》从哲学、文学、生态学的交叉点上,探讨现代哲学人类学的课题;《民族心理与民族意识》和《早期中国“人”的观念》等,探讨了民族性和民族心理等论题。论述公共关系与社会行为的图书,如《公共关系学教程》是一部吸收国内外研究成果、体系新颖的公共关系学著作,《公关心理学》系从心理学角度研究公共关系学的著作,《谈判学》是系统研究谈判理论的专著,

《评价活动论》乃运用心理学、决策学、价值工程、系统论等来研究评价活动,《交往行动理论》是德国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主要人物哈贝马斯的代表作。论述恋爱、婚姻、家庭、就业和青少年问题的著作,如《婚姻家庭关系要论》从社会学、法学、心理学、伦理学等视角,探讨了婚姻家庭关系,《当代大学生的择业心理与技巧》论述了大学生择业的市场预测、主导意识及技巧等,《当代青年社会学》从社会学角度研究了现代青年,《少儿生日礼品珍藏》图文并茂,有知识性、艺术性和趣味性。

人口学是本年度图书出版的又一热点,本年鉴共收录了 17 种著作。其中有总论人口学的著作,如《刘铮人口论文选》选收我国著名人口学家刘铮的论文 23 篇,概括了作者的人口学术思想。《人口政策学》、《当代人口与社会》和《人口——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等,分别联系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现实,对人口政策、人口与社会发展、人口与经济增长进行了理论探讨。《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发展报告》、《中国人口迁移与发展的长期战略》和《中国农村人口研究》等,分别研究了中国人口与发展、中国人口迁移与发展以及中国农村人口等问题。关于中国人口的调查及其研究,出版了一系列著作,其中人口学专家辜胜祖等主编的《当代中国人口流动与城镇化》,以人口普查和实地调查资料为依据,综合运用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对中国人口流动、人口城镇化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作了多层面、多角度的剖析与研究,提出了建设性的对策。此外,《人口质量的经济分析》、《中国古代人口史专题研究》、《中国常用人口数据集》、《中国城市人口迁移》、《中国农民的社会流动》、《河南人口·资源·环境丛书》、《贵州省人口地图集》、《内蒙古少数民族人口素质研究》等,较为深入地研究了中国人口问题以及提供了中国人口调查资料。

管理学著作,本年鉴共选收 28 种,约占收录总数的 28%,是收录最多的一个学科领域,主要涉及现代化管理技术与方法、决策学领域。前者如《办公自动化》、《微机在办公自动化中的应用》、《办公自动化教程》、《文书学理论与文书工作(修订本)》、《秘书学》、《实用秘书学》、《办公室的学问》等,分别论述了现代化的管理技术和文秘工作的理论与方法;后者如《给领导者 100 个思路》、《相似、预测、决策》、《仿真决策引论》、《管理决策的理论与实践》、《决策案例文库》、《韬略智慧系列丛书》等系研究决策理论、技术的专著及实证研究的资料书。《谋略库》、《新编智

谋大全》、《中外诡谋全书》、《古今谋略辞典》、《中国谋略事典》、《智谋百科》等是提供决策知识、方法和事例的工具书。

人才学领域,本年鉴也收录了几种著作。其中《现代能力导向》对现代人如何提高适应社会生活能力进行了阐述,《人才资源学导论》主要就人才资源的个体育成、社会开发、宏观调控及微观管理等作了论述。

几部大型的工具体书和丛书,知识性、资料性较强。其中《中国社会经济统计百科全书》比较全面收集了中国尚未建立的各类社会经济统计与学科知识资料。《济南名士丛书》整理收集了历代济南名士的

著述,是一种新编地方丛书。《澳大利亚丛书》除提供有关澳大利亚的重大历史事件和自然与社会概况外,主要介绍澳大利亚的贸易、投资、金融及有关统计资料,对研究国别经济颇有参考价值。

此外,《谋事之基·成事之道——组织部长谈调研》、《中国社团史》、《中国现代社团辞典》、《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史》及《统计指标导论》、《统计制图》等,选题也很有特色。

从年鉴收录情况来看,1994年度有关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论、社会科学现状、社会科学机构与团体、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社会科学教育等领域的图书甚少,统计学门类也比较薄弱。

政治、法律类图书评介

胡先媛

1994年政治法律类图书的出版,据不完全统计,已达3583种,新出图书3039种,总印数为7123万册,其内容可以分为两部分来评述。

1. 政治类图书

政治理论方面的著作主要反映在党的建设、社会主义、人权及有关农民、青年、妇女问题等方面。党的组织建设是党建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宣传学习组织工作方面的基本原理、基本知识,是党建读物出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党的建设方面,出版了有理论性较强的著作,如赵云献著《马克思主义党学基础》集中党史、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学说史及党建理论于一体,所论及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党建的基本理论观点,均有历史的清晰线索和内在严密的逻辑联系;还出版了一些理论联系实际的著作和务实的工作规程,如中共中央组织部组织局编的《民主集中制理论与实践》就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还有孙鹏昶、王忠明主编的《党团务工作规程》、韩茂华主编的《党政机关事务工作》等。另外,在这类图书中,有关党风廉政问题的图书也有很多,如安启元主编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的党风廉政建设》、中共铁道部纪律检查委员会编的《清廉曲与警世钟》及王克荣、郑志飏主编的《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廉政建设史》等,说明人们对这些问题较为关注。1994年出版的有关青年、农民问题的著作也较多,除了一些通

俗读物外,多为理论研究著作,如刘锋著《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问题》构建了一个关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问题的理论体系。而单光等主编的《中国青年发展报告》、石巧兰等著的《当代中国农村妇女问题概观》则是既有理论深度又有实际数据的调查研究著作。朱光磊主编的《大分化新组合——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运用阶层分析的方法,对我国80年代以来的阶层进行了总体论述。卫兴华主编的《中国社会保障制度》、郑功成的《中国社会保障论》、侯文若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等则是对社会热点问题的研究。

大量出版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图书,是这几年图书出版的热点之一,社会主义、人权问题仍是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关于社会主义理论的图书主要有魏新生的《中国:走向成功之路》、荣开明、朱志杰主编的《改革: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邓全意的《新世纪的奠基理论》、丁祯彦等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论》、徐鸿武主编的《科学社会主义(修订版)》、胡茂才主编的《科学社会主义》、张维久主编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唯物史观的发展》及江流主编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丛书》,徐崇温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则通过多层次的历史比较,阐述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关于人权问题的研究,1994年所出的图书大部

分都是一些史类著作和带有总结、集成性质的汇编书籍,如黄森、沈宗灵主编的《西方人权学说》上下册,选编了从17世纪至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和著名学者的经典论述,较为完整地反映了西方人权学说发展的历史及西方社会关于人权的基本观点。萧宝保等著的《中国百年人权史》系统回顾了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的人权状况。刘书林等著《当代中国人权状况报告》、苏明主编的《中国人权建设》则较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我国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权的实际情况。此外,还有一些世界各国人权资料汇编,如《世界各国人权公约》、《人权基本文献要览》、《发展中国家与人权》等,为研究人权问题提供了基本和必要的参考资料。

政治学著作中,吴惕安等主编的《当代西方国家理论评析》对当代西方政治学在一些重大国家问题上的观点进行了分门别类的系统研究。顾肃的《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研究、总结了西方(主要是欧洲和北美地区)有代表性的理论观点,并对各种政治法律思想的产生、发展、演变的社会条件及对后世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此外还有王楷模的《现代政治概论》、刘利主编的《转换中的世界格局与国际社会》、曹德本的《儒家治国方略》、李治安的《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古代行政管理及官僚病剖析》等。

2. 法律类图书

法理学类图书品种有:孙国华主编的《法理学教程》是在1987年出版的《法学基础理论》的基础上,吸收国内外法理学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编写的大学法学各专业的基础教材。徐永康等著的《中国法制史》详细地介绍了我国各个朝代的法制演变史,对各朝法制的特点、立法依据、施行情况以及相关法律条文作了分析。徐鸿修、安也致著的《春秋贵族法规研究》对贵族法规的形成、特点、内容以及对后世法律的影响进行了研究。而胡星桥、邓又天主编的《读例存疑点注》则是对清末法律著作《读例存疑》的考证、阐述与注释。

有关部门法的图书出版很多,涉及的范围较广,其中宪法、刑法、经济法、知识产权法著作最多。文正邦等著《共和国宪政历程》,概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政发展的历程,从新的高度和视角上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若干重要经验和教训。王叔文的《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导论》和杨静辉的《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100问》则对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精神、内容和条文,作了全面系统的介绍。在这些著作中,既有围绕“二五”普法教育的通

俗性读物,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知识讲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法规选编》、《房地产市场法律常识百题问答》、《中国刑法之最》、《怎样打官司》等,又有一些理论性、系统性较强的研究著作,如苏惠渔等编著的《中国刑法教程》分刑法概论、犯罪概论、刑罚概论、量刑概论、罪刑各论五部分全面论述了其概念、研究对象、本质、功能和目的、体系与种类及处理方法等。董安生的《民事法律行为》是专论民事法律行为制度的学术著作,张旭的《减免刑事责任理论比较研究》对法学研究中的热点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研究,柳经纬主编的《中国民法》系统阐述了我国民法体系的基本概念、调整对象、本质作用和基本原则,并进行了具体的阐述。李洁的《犯罪结果论》、叶高峰主编的《暴力犯罪论》、赵秉志主编的《妨害司法活动罪研究》,则是系统研究某一类型犯罪问题的理论著作。青锋著的《犯罪本质研究》则是在我国刑法学中的犯罪本质理论进行深刻反思的基础上,初步建构一个以犯罪本质为中心的罪与非罪界说理论体系。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理论与实务兼备的读本,如黄进主编的《区际司法协助的理论与实务》,上篇为理论研究篇,在比较区际司法协助与国际司法协助、民事司法协助与刑事司法协助之异同的基础上,对司法协助的一般理论问题、中国内地与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民商事司法协助问题进行论述,分析、总结了国际民商事司法协助与区际民商事司法协助以及国际刑事司法协助与区际刑事司法协助的相同点与不同点。下篇为实证分析篇,主要总结了1997年以前中国大陆与香港、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司法协助行为的性质特点及各种模式,分析了各种做法的利弊得失,并考察了这些做法在祖国统一后的应用价值。

除此以外,为了配合普法教育和实施各项法律,还出版了许多法律综合汇编及对法律条文和疑难问题的阐释,如《民事诉讼适用意见释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新公司法释义》及《市场经济法律丛书 新经济合同法实用问答》等。

国际法方面,李玉泉主编《国际民事诉讼与国际商事仲裁》系统地阐述了国际民事诉讼和国际商事仲裁的基本制度,在比较和分析有关国际公约和国外立法的基础上,对我国的有关立法和制度作了详细的评述,是一部融学术性和实务性于一体的著作。江伟钰、江伟铿著的《国际环境保护法学》从国际法角度阐述了国际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列举了美、日、德、前苏联等国的环境保护法律和对策。叶兴平著